

南陽漢代畫像石墓

南阳汉画馆编著

主 编 韩玉祥 李陈广

副主编 魏仁华 张兼维 曹新洲 凌皆兵

河南美术出版社

序 言

南阳有悠久的历史。两汉时期,是南阳历史上辉煌的时代。西汉时,南阳郡治宛是全国五大都市之一,故司马迁称宛“亦一都会也”;西汉末年,王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并由此登上了新朝的宝座;东汉时,南阳是开国皇帝刘秀发迹的地方,史有“帝乡”,“南都”之称。由于南阳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地位,就为两汉时兴起的厚葬之风提供了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两汉时期的墓葬,较之前代的形制和构造,种类更多而且更加富于变化。统治阶级的冢墓,主要是木椁墓、空心砖墓、土洞墓、砖室墓。另外出现了以“山石为椁”的崖墓,以画像石板代替髹漆彩绘木板的画像石椁墓,以石为室,室壁雕刻画像的、仿地上第宅建筑的画像石室墓,即画像石墓。

我国发现汉代画像石的历史很早,出土汉代画像石墓的地区也很多,就其地域而言,主要分布于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徐州周边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故乡南阳周边,其他有山东地区、陕北、晋西北地区、四川成渝地区、河南中部地区。另外,在北京丰台、浙江海宁也发现了与中原地区相似的汉代画像石墓。就其数量而论,南阳已科学发掘汉代画像石墓40余座,集各类画像石3000余块。故信立祥先生在《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中调整了所谓中国汉代画像石墓的四个中心分布区,但依各区的重要性,其排列次序,河南南阳、鄂北区仍列第一。

埋藏于地下一千八百余年的汉代画像石墓,今日已基本十墓九空,但遗下的汉代画像石刻却大部分完好如初。其画像内容有生产类、生活类、祥瑞类、祛除类、故事类、神话类、天象类、图案类等,装订起来,犹如一部“绣像的汉代史”,它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实物材料,“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翦伯赞:《秦汉史》)。

价值连城的汉代画像石墓,片石千秋的汉代画像石刻,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并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而是处于“日渐损毁”的境地,有的被弃于荒野,任其风剥雨蚀;有的被掘出作为再建墓葬的材料;有的则被作为饭桌、路石、桥基一类“代用品”。损毁的墓葬和画像石刻,今日已无法作出准确的估计。南阳汉代画像石被世人注目,是本世纪初叶的事情。1923年,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始有发现”。之后,张中孚、孙文青作了大量搜集与研究工作。1930年,关百益出版了南阳第一部汉画像石图录——《南阳汉画像集》;1932年,孙文青在南阳草店发掘了中国第一座汉代画像石墓;1937年,孙文青又出版了《南阳汉画像汇存》一书。其间,河南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南阳县长罗震先生于1935年建立了我国第一座汉代石刻艺术博物馆——南阳汉画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生前十分注意南阳汉代画像石拓片的搜集工作,直到他逝世前两个月还致信南阳王正朔,“桥基石刻,亦切望于水消之后拓出”。

“水消自有石出日”。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南阳汉画像石的保护工作。1956年,省政府拨款先后拆除了用画像石建造起来的南阳市魏公桥和七孔桥,搬迁了南阳汉画馆,开展了田野考古调查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至1998年10月,省、市、县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南阳七里园汉画像石墓(1956年4月)、杨官寺汉画像石墓(1962年3月)、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1972年6月)、南阳市李相公庄许阿瞿墓志画像石(1973年3月)、唐河新店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1978年3月)、方城东关汉画像石墓(1977年10月)、南阳县赵寨汉画像石墓(1972年2月)、邓县长冢店汉画像石墓(1973年5月)、唐河石灰窑汉画像石墓(1978年12月)、唐河湖阳汉画像石墓(1983年6月)、南阳市刘洼汉画像石墓(1986年7月)、

桐柏安棚画像石墓(1993年3月)、南阳市中建七局机械厂汉画像石墓(1995年3月)、南阳粮校汉画像石墓(1998年10月)等,发表论文、文章300余篇,出版各类图录、专著20余部。其中代表性的图录和专著有《南阳汉代画像石刻》(1981年)、《南阳汉代画像石》(1985年)、《南阳汉代画像石砖》(1989年)、《南阳汉代墓门画艺术》(1989年)、《南阳两汉画像石》(1990年)、《南阳汉画早期拓片选集》(1993年)等。1976年,汉画像石“乔迁新居”,并于1987年新建了大型的南阳汉画馆。1985年,在南阳召开了纪念南阳汉画馆建馆50周年暨鲁迅搜集南阳汉画拓片5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3年,又在南阳召开了'93中国汉代画像石砖国际学术讨论会。可以说,南阳为中国汉代画像石的保护与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遗憾的是在1997年之前,在南阳乃至在全国尚未出版一部专题介绍南阳汉代画像石墓的专著。正当人们翘首企盼的时候,南阳汉画馆组织编写的《南阳汉代画像石墓》一书脱稿了,这是一部世纪之交概括与总结南阳汉代画像石墓考古的力作,对于加强国家对汉代画像石的保护,开展汉画科学研究工作,继承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一书,较前著录不同之处是突出一个“墓”字。本书从西汉第三代皇帝刘恒的“方中”(帝陵讳称,即“陵上土作方也”)——“因起山,不起坟”的霸陵“崖墓”说起,到河南商丘梁孝王墓、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山东曲阜九龙山鲁王墓等帝陵、诸侯王“崖墓”,引出南阳汉画像石墓的产生。南阳汉代画像石墓大抵产生于西汉宣帝、昭帝时期,这一结论是从44座汉代画像石墓“排队”中得出的。早期墓葬的代表是南阳市赵寨墓。从东汉王朝建立至安帝为中期,中期是南阳汉代画像石墓的兴盛期,代表性的墓葬是唐河电厂墓。顺帝之后为晚期,晚期是南阳汉代画像石墓的衰落期,代表性的墓葬有方城党庄墓。由于南阳汉画像石墓中有新朝纪年(公元18年)墓、东汉纪年(170年)画像石,以及邻里襄县纪年(132年)墓为分期“标尺”,可以说,南阳汉代画像石墓的分期是相对科学的。三国魏晋时期,南阳仍有不少画像石墓出土,但这一时期的画像材料使用混乱,有的门吏画像竟头向朝下,不难看出这是后人利用汉人的建筑材料营建起来的所谓画像石墓,即“再建画像石墓”。此类墓葬的出现,表明三国魏晋时期经济的衰败和厚葬观念的转变,这一命题的提出,反映出汉代画像石研究领域的拓宽。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一书较前著录的显著特点是图文并茂。该书由“概论”和“图版”两部分组成。如果读者从10万字的“概论”中可以管窥到一斑的话,那么,丰富多彩的“图版”可以使你看到斑豹的全貌。该书使用汉代画像石照片、拓片610幅,其中有许多发掘工地的原始照片。另外,还附有60余幅汉代画像石墓的平、剖面图,使1800年前仿地上第宅建筑的画像石墓,即“地下宫殿”再现于20世纪的今天。

“书山有路勤为径”。著名考古学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两汉时期人口众多,疆域广阔,经济发达,厚葬成风,因此,汉墓遗存的数量及其包含物的广泛性,在各代古墓之中,都是极为突出的”。“对于如此数量的汉墓,如要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其工作量之大,足以使人望洋兴叹,不敢轻易动手”。“可是这样的工作总是应该进行的,在有了第一本系统著作之后,再不断补充,修正而完善之。要使这项研究达到成熟的程度,恐怕需要不止一代研究者之力,但奠基者一定会受到长久的尊重”(李如森著:《汉代丧葬制度》)。南阳汉画馆韩玉祥、李陈广不辞劳苦主编的《南阳汉代画像石墓》一书,即使尚未达到“成熟的程度”,但一定会象俞先生所说的“受到长久的尊重”。

王建中

1998年10月18日于南阳市文物局

目 录

序言	(1)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概论	
引言	(1)
第一章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产生的历史背景	(4)
一、南阳市的地理环境	(4)
二、南阳的历史地位	(4)
三、汉代南阳的政治经济文化	(6)
四、汉代的厚葬习俗	(9)
第二章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的分期	(11)
一、南阳汉代画像石墓的发现过程及分布	(11)
二、南阳汉代画像石墓分期研究	(12)
第三章 南阳汉代画像石的主要内容	(19)
一、天文星象	(19)
二、舞乐百戏	(21)
三、角抵	(23)
四、社会生活	(24)
五、历史故事	(26)
六、神话传说	(27)
七、祥瑞、升仙、辟邪	(28)
八、建筑	(30)
九、图案	(31)
十、榜题	(31)
第四章 南阳汉代画像石的艺术成就	(33)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分布示意图	(38)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一览表	(40)
南阳市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	(41)
唐河县湖阳镇汉画像石墓	(42)
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	(43)
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	(48)
唐河县电厂汉画像石墓	(64)
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久画像石墓	(70)
唐河县石灰窑村汉画像石墓	(81)
唐河白庄汉画像石墓	(82)
南阳草店汉画像石墓	(84)

南阳市七里园汉画像石墓	(88)
南阳英庄汉画像石墓	(90)
南阳军帐营汉画像石墓	(93)
南阳石桥汉画像石墓	(96)
南阳县王寨汉画像石墓	(101)
邓县长冢店汉画像石墓	(104)
方城东关汉画像石墓	(110)
方城县城关镇汉画像石墓	(114)
唐河县针织厂二号汉画像石墓	(118)
南阳县英庄汉画像石墓	(119)
南阳蒲山一号汉画像石墓	(128)
南阳市刘洼村汉画像石墓	(133)
南阳市麒麟岗汉画像石墓	(135)
南阳县熊营汉画像石墓	(159)
南阳市第二化工厂三十号汉画像石墓	(163)
南阳蒲山二号汉画像石墓	(167)
南阳中建七局机械厂汉画像石墓	(172)
南阳市中原机校汉画像石墓	(176)
方城党庄汉画像石墓	(178)
邓州市梁寨汉画像石墓	(179)
桐柏县安棚汉画像石墓	(182)
南阳市邢营二号汉画像石墓	(183)
南阳县高庙汉画像石墓	(184)
南阳东关汉画像石墓	(192)
南阳市西关汉画像石墓	(194)
南阳市许阿瞿汉画像石墓	(196)
南阳县十里铺汉画像石墓	(198)
南阳市王庄汉画像石墓	(203)
南阳市独山西坡汉画像石墓	(209)
南阳市建材试验厂汉画像石墓	(211)
南阳市第二化工厂二十一号汉画像石墓	(213)
南阳市药材市场汉画像石墓	(215)
南阳市邢营一号汉画像石墓	(217)
南阳市十里铺二号汉画像石墓	(222)
南阳市妇幼保健院汉画像石墓	(224)
外文提要	(229)
后记	(233)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概论

引言

汉代画像石墓,是指西汉中期到东汉末以石刻画像为装饰的石结构或砖、石混合结构的墓葬。它的出现和社会生产、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发展分不开。

我国远古原始时代,社会生产力低下,流行薄葬习俗。《孟子·滕文公》上说:“盖上古尝有不葬其亲(人)者,其亲(人)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盖归反藁(取土用具)而掩之。……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人),亦必有道矣。”孟子所说的“举而委之于壑”,就是将死者的尸体由原住处移往野外而弃之(即露天葬)。此种葬法可能流行于旧石器时代。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因人们不忍心再看到其亲人的尸体被“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的悲惨场面,便改为“掩亲之道”的土葬。根据考古资料来看,我国最早的墓葬是17000多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墓葬,既无坑圻,又无棺槨。和孟子说的“上世”稍后“盖归反藁而掩之”大略相一致。

古人说:“墓者,没也”,“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①人死后埋藏在地下就没有了,如此简单而已。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一般多是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墓。且小而浅,仅能容纳死者的尸体。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些地区已用木棺作葬具。大汶口和马家窑文化中,分别出现少数用原木或木板制作的简易棺槨。此外,还发现有用树枝掩盖尸体的情况。这时期的墓葬,大多在旷野之中,积薪以覆之,不聚土为坟,墓上也不种树木。故《周易·系辞下》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真正的“没”了。

然而,人心不古,“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桐木为棺,葛采为缄,下不及泉,上不泄臭”^②。表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出现了土坑竖穴的木槨墓。因尸体在棺中一般是仰卧四肢顺直平伸,故木棺通制也按照尸体做成长方形,其墓穴也挖成竖井长方形。这种埋葬法大抵有衣衾,有棺槨。或者只有衣、棺,而无衾与槨。衣以蔽体,棺以藏尸易舁,衾复于衣上,槨周于棺之外。墓圻深浅宜不影响农耕为合适。置棺其中,掩土而埋之,封余土于墓上,对尸体的处理就算完了。《墨子·节葬》下说:“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死者为人恶之,故云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这是商周时期一般人的埋葬之法,也是中华民族一般实行的土葬法。当然,奴隶主、奴隶不在其中。

商周时期,为青铜器盛行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们迷信鬼神的观念也开始盛行起

来。《礼记·表記》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更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③。至于鬼神是什么样子,大家都没见过,谁也说不清。于是人们乃从现实生活中想象出神鬼的生活形状来。人死而有鬼,鬼是人的灵魂,鬼的生活就是人的生活继续。故人死后按照生人的衣、食、住、行、娱乐、战争等的需要安排随葬物品,因而在奴隶主阶层中产生了厚葬之风。他们葬有深坑,埋有棺槨,地位愈高,墓的形制愈大,随葬品也愈丰富。《墨子·节葬》篇中说:“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然后金玉珠玕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圻;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槌、壶、鉴、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如:商代第二十三王武丁的配偶“妇好”之墓,墓圻为长方形竖穴,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8米。墓上有祭祀建筑,墓内有二层台和腰坑,葬具为木棺木槨,殉人16个,狗6只,共出土铜器、玉石器、骨器、象牙器、陶器、蚌器等各类随葬品1928件。从各地发掘清理的商代墓葬看,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以木质的棺或棺槨为葬具。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一般都有随葬品。大、中型墓多有青铜礼器、玉器、货贝等随葬。小型墓则用陶器和货贝随葬,中、晚期大、中型墓中殉人、狗和人祭之风大盛。这种土坑竖穴木槨墓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战国晚期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从春秋晚期开始,中国进入了铁器时代,从而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这种变革在丧葬制度上也得到充分的反映。在战国晚期的各种中小型墓葬中,出现了以洛阳烧沟为代表的横穴式土洞墓,也有用一种体积庞大的空心砖墓代替木槨墓,如郑州岗杜为代表的木盖板空心砖墓^④。人殉在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除一些大墓里仍然存在外,一般不多见了。随之而来的木俑和陶俑随葬的风俗开始盛行。另外,在河北平山还发现了用河光石和加工成长方形的石头,垒砌而成的石槨墓^⑤。

石槨墓出现的历史很早,据《汉书·刘向传》记载,春秋时期,宋国就已经有了石槨墓,“宋桓司马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遭到孔子的非议。又说:“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槨为游馆”。师古曰:“多累石作槨于圻中,以为离宫别馆也。”

西汉，是继秦之后建立起来的又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西汉初年，承继的是秦王朝的破败局面，百废待举，事务繁剧，而又财政匮乏。《史记·平准书》中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在如此窘迫的情况下，汉初统治者为了稳定和巩固其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得不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因此，在丧葬制度上，不可能有大的突破。经过高后、惠帝、文帝、景帝的精心经营治理，社会经济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六七十年后出现了“蓄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⑥“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⑦的安定繁荣局面，史称“文景之治”。

由于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始于商周时期的厚葬之风，这时又重新兴起。上自帝王、皇亲国戚，下至郡县官吏、巨贾豪家，竞相营造冥宅大墓。“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玩好、货宝、钟、鼎、壶、滥（鉴）、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槨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⑧。这一时期的墓葬，和早期相比，从形制到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按照“天子葬”营造的大型木槨墓。如：1974年发掘的北京大葆台西汉燕王刘旦墓^⑨就是此类墓葬。该墓坑口大底小如斗状，底口南北长23.2米、东西宽18米、深3.7米。全墓由封土、墓道、甬道、外回廊、黄肠题凑、前室、后室等部分组成。黄肠题凑正南有门，门内有三梁四柱的“便房”，为仿效生人居室和宴飨的建筑。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斩山为槨，穿石为藏”的大型山洞墓。汉文帝刘恒就曾一度想为自己营造一座这样的大墓，后在张释之的进谏下，才打消了这个念头。《汉书·刘向传》中说：“孝文皇帝居霸陵，北临侧，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槨，用绌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张释之说的话，被后世提倡薄葬的人们奉为至理名言，流传千古。王符在评论霸陵时说：“文帝葬于芷阳，……不藏珠宝，不造庙，不起山陵。陵墓虽卑而垒高”^⑩。汉文帝所葬之霸陵，究竟是“以北山石为槨”的厚葬型墓，还是“不起山陵”的薄葬型墓，有待于今后考古发掘去证实。但至迟是在景帝时期，就出现了“斩山为槨、穿石为藏”的大型山洞墓。据近些年来的考古发掘和调查资料获知，仅中原地区西汉时期的大型山洞墓就有20余座^⑪。这些墓的营造方法是：首先在半山腰较平坦的地方向山内穿凿巨大的洞穴，然后按照地面上的府第建筑群设置墓室。以洞穴石壁代替传统的木槨，它在墓葬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梁孝王及其家族山洞墓群。

梁孝王，名刘武，是汉文帝之子，汉景帝之弟，初封代王，都中都（今山西平遥）。文帝十二年迁为梁王，都梁（今河南开封市），后迁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史称梁孝王。因受窦太后宠爱，“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⑫。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梁孝王“发疾暴死”^⑬，葬于“梁苑”所在之芒砀山。《水经注》载：“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斩山为郭，穿

石为藏，行一里，到藏中。”据调查，梁孝王墓凿于今河南商丘市永城县东北芒山镇保安山南端，北魏之前即被盗掘，现存墓室尚且完整，东西长56.3米、南北宽30.5米、高4米。由墓道、甬道、墓门、享堂、主室、侧室、回廊以及排水沟等部分组成。整个墓室面积约700余平方米。结构规整，布局对称，规模宏大，气势壮观，宛然如一座庞大的“地下宫殿”。

199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清理的保安山二号墓，南距梁王墓200米处，很可能是梁孝王妻子李后之墓^⑭。该墓贯通山的两端，全长210余米，最宽处70余米，最高处4.4米。由2个墓道、3个甬道、34个侧室、前庭、前室、后室、回廊、天井和排水沟等部分组成，总面积1600多平方米。整个墓葬全部鑿凿于山岩之中，结构复杂，设计合理，凿制精细，气势磅礴，为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山洞墓。1990年在该墓顶南侧50米处的陪葬坑内，曾出土铜器、玉器等7000余件。此外，1987年发掘的柿园墓^⑮，位于保安山梁孝王墓东南500米的山顶上，可能是梁孝王之子、第二代梁国国王刘买之墓。该墓由墓道、甬道、主室、耳室、过道等部分组成。墓道全长约70米，宽4.4米、高12.5米。墓道及甬道用重约1吨左右的2500块长方形塞石封填。墓道内和塞石的下边，分别出有彩绘陶俑、鎏金鎏银车马饰件、弩机、铜镞等1万余件和上万斤武帝以前铸造的铜钱。墓葬主室长9.5米、宽5.5米、高3米。墓壁刻凿精细，顶部及两侧绘有青龙、白虎、朱雀和云气纹为主要内容的壁画，颜色鲜艳，线条流畅，整个壁画栩栩如生。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较早、保存较好的壁画；也是壁画墓向汉画像石墓过渡的前兆。

值得注意的是，在保安山二号墓中室左侧的厕室便坑垫脚石和柿园墓主室一侧的厕室便坑垫脚石上面，分别发现有用阴线凿刻的菱形回纹和长青树，侧面有横竖纹衬地的阴线凿出的鸟、树及亭子画像。由于刻工粗糙，加上位置不显著，故画像不是十分醒目。柿园墓的主人为恭王刘买，《汉书·诸侯王表》载：“孝景后元年，恭王买嗣，七年薨。”景帝后元元年是公元前143年，七年为武帝即位不久的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保安山二号墓如果是梁孝王王后不错的的话，也是武帝初年的墓。这两座凿有画像石的墓主均死于武帝初年，前后相距约十年左右，基本上是同时期的山洞墓。其凿造年代，按照汉代人死前就开始建墓的习惯也许还要早一些。因此，这两座墓内所刻的画像石，皆可视为西汉早期偏晚的作品^⑯，是河南境内目前已出土最早的汉画像石。它开了墓内雕凿画像之先河。

西汉时期，中原地区的大型山洞墓除梁孝王及其家族墓外，较著名的还有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⑰、江苏龟山第六代楚王刘注墓^⑱、徐州石桥楚王王后墓^⑲、山东曲阜九龙山鲁王及其家族墓^⑳、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㉑等。这些“斩山为槨、穿石为藏”规模宏大的山洞墓，都是诸侯王和王后的墓葬。而一般的郡县级官吏和地主主要开凿这样大的山洞墓，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来看，都是不太可能的。但他们却以自己的经济实力，独出心裁，利用“斩山为槨、穿石为藏”造墓的实践经验，开采就近山上的石料，缩小墓葬规模，仿照宅第建筑，凿石刻画，构筑成纯石结构或砖石混合结构的墓室，汉画像石墓就这样别开生面地应运而生了。

汉画像石墓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标志着汉代社会经济文

化的发展进步,同时也标志着进入封建社会时代后,丧葬习俗文明程度的真正提高。汉画像石是作为汉墓建筑材料出现的,然而石刻画像又构成了一个独立有序、内容丰富、形式成熟的艺术系统。汉画像石的双重功能,为汉画像石墓赋予了特殊的文化价值,而成为中国墓葬文化的一个里程碑。

由于汉代南阳显赫的政治经济地位和丰厚的文化基础,使南阳汉画像石墓比全国其它地区更为集中,画像石出土量更大,画像艺术风貌也更为完整。研究南阳汉画像石墓,将对探索汉代墓葬的演变和汉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艺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注释:

- ①《礼记·檀弓上》。
- ②⑩《潜夫论·浮侈》。
- ③《墨子·明鬼》。
- ④河南省文物工作一队:《郑州岗杜附近古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0期。
- ⑤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期。
- ⑥《汉书·刑法志》。
- ⑦《史记·平准书》。
- ⑧《吕氏春秋·节丧》。
- ⑨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6期。
- ⑪罗二虎:《试论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的崖墓》,《考古与文物》1997年3期。

- ⑫《史记·梁孝王世家》。
- ⑬《汉书·五行志》。
- ⑭⑮《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 ⑯吕品:《汉画像石的起源、雕刻方法与冶铁技术发展之关系》,《河南省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 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满城汉墓发掘纪要》,《考古》1972年1期。
- ⑱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1期。
- ⑲徐州博物馆:《徐州古桥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11期。
- ⑳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5期。
- ㉑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8期。

第一章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南阳市的地理环境

南阳位于东经 110°59'—113°48'；北纬 32°19'—33°48' 之间，在河南省西南部，东西长约 260 公里，南北宽 170 公里，总面积为 26530 平方公里。现辖邓州市、卧龙区、宛城区、南召县、内乡县、西峡县、淅川县、镇平县、新野县、方城县、社旗县、唐河县、桐柏县。

南阳是一个古老的地名，它是根据地质、地貌、地势、方位等因素对一个地理实体的命名。其中“南”是对方位而言，“阳”则是指地貌势态。

南阳之“南”字在夏代就有方位上的含义。黄河流域素有“中华民族摇篮”之称，黄河流域两岸建立的历代王朝和分封的诸侯国林立，古人概念中称“中国”。既有中国之“中”，必然就有东、西、南、北之“外”，南阳地理位置处于当时“中国”之南，故有“南”字之义。

我国处在北半球，故山之南坡，水之北岸是向着太阳的。南阳这一广大地区既在伏牛山之南，又在汉水之北，当属“阳地”。《释名·释州国》中说：“南阳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也。”

南阳北靠伏牛山，东扶桐柏山，西面是岩溶地貌的肖山，南临汉江。绵三山而带群湖，枕伏牛而蹬江汉，是处在一个三面群山环绕，层峦叠嶂，风景秀丽，南部开口的山间盆地。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呈簸箕状，与湖北的襄樊盆地合称为“南襄盆地”。境内为山峰、丘陵和平原的组合地貌，山峰大部分在海拔 1000 米以上。伏牛山、桐柏山脉呈西北——东南走向，它既是秦岭山系的余脉，也是长江、黄河、淮河的分水岭。南阳境内河流纵横，分属长江、淮河水系。主要河流有唐河、白河纵贯盆地中央；丹江及支流淇河、淅河纵流盆地西部；东部是发源于桐柏境内桐柏山主峰太白顶的淮河，干支流量丰富。正如张衡在《南都赋》中所描述的“其地势则武

关阙其西，桐柏揭其东，流沧浪而为隍，廓方城而为浦，汤谷涌其后，洧水荡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通。”

南襄盆地是在中生代的白垩纪形成的，同时在其周围也出现一些小盆地。由于古代陆相湖泊不断接受泥沙沉积，湖水下泄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湖积平原，河流的下游也形成了一连串的河谷平川，这些湖积平原和河谷平川的上部形成了肥沃的积层土壤，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南阳的气候具有南北过渡地带的特征。光照充足，无霜期长(大约在 222—241 天，初霜在 11 月上、中旬，终霜在 3 月中、下旬)，降水充足，且汉代的气候比现在湿热，因此适合农作物和各种植物生长。

南阳的矿产资源主要有天然碱、石油、金、银、水泥灰岩、大理石、铅、锌、玉石、铁、煤等。其中桐柏县的吴城是我国大型优质碱矿床，居全国首位；产于南阳市独山的玉石居全国前列。另外，稀有的动植物资源也很丰富，如动物中的大鲵、猕猴、金钱豹，植物中银杏、粗榧、连香树、杜仲、猕猴桃、华中五味子等。自 1980 年以来，先后建立了多处自然保护区，如桐柏县太白顶自然保护区面积 3533 公顷，北亚热带常绿及落叶阔叶林高等植物 2000 多种，另有陆栖脊椎动物 200 余种；内乡宝天曼自然保护区是全省生物资源的储源地和珍稀动、植物资源保存发展、驯化基地。还有南召牧虎岭宝天曼保护区、西峡老界岭保护区、西峡大鲵保护区。这些保护区不仅是保护和利用珍稀动植物的基地，而且有的已被当作旅游资源开发利用。

肥沃的土地、广阔的平原、充沛的水资源和湿热的气候，使南阳很早就成为我国农业文明的摇篮之一；而丰富的矿产和动植物资源又为南阳在文明时代区域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南阳的历史地位

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南阳在历史演变中据有特殊的位置。在史前社会，南阳这片富饶适宜的土地上留下了原始人闪光的足迹；在漫长的文明社会中，朝代更替，世道变迁，南阳在历史的曲折和迂回中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辉煌。

1978 年 2 月在南召县云阳镇李楼村杏花山发现了猿人遗址，出土猿人右下第二前臼齿化石一枚，称为“云阳猿人”，距今约四、五十万年，与北京猿人、郧西猿人的时代相当。1980 年 6 月，距云阳猿人三公里的小空山发现一批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物——石器 45 件，其中包括石核、尖状器、刮削器、石锤、石球、雕刻器等。据考古学家考证，这批石器应为云阳猿人的遗物，小空山是猿人居住的遗址。它为探

索中原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周围地区诸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被称为“小空山文化”。是我国直立人阶段第二处证实人类已会使用火和管理火的洞穴遗址，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一次重要发现，表明南阳是中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的氏族村落遍布南阳各地，现已发现有 80 余处遗址。从对部分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发掘的遗址主要有：

黄山遗址，距宛北 15 公里，是一处保存较好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属仰韶文化晚期。在发掘的 1600 平方米内发现房基三处，共 10 间，墓葬 57 座。其中成人墓 44 座、儿童瓮棺葬

13座,成人墓皆有多少不等的随葬器物。出土的玉器经鉴定为南阳独山玉,说明这里曾是先民们固定的聚居点。

在桐柏县月河镇闵岗村也发现有先民遗址,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8米。地表散布遗物有红陶敛口钵、陶杯、锥状鼎足、彩陶片、蛋壳黑陶片、绳纹陶片、鬲足、纺轮以及石铲、斧、凿等。属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遗存。

八里岗遗址,在邓州市城郊乡白庄村八里岗西北。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4米。1992—1994年对该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发掘墓葬110余座,获得仰韶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大批遗物。采集的陶器标本有彩陶、灰陶罐,文化序列比较完整。特别是发现了排房式建筑遗址30余座,是我国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排房式建筑,对中国古代建筑史及史前社会聚落面貌的研究探索极为难得。

从已发掘的遗址可以看出,此时南阳境内的原始人类已过着较为安定的聚居生活,已有固定的埋葬制度,永久性的建筑物已普遍存在,母系社会已开始解体,父系社会逐步确立。到了夏代,天下分为九州(冀、青、兖、徐、扬、荆、豫、梁、雍),豫居其一,为夏都治所。其范围南至荆山,北达黄河。南阳古属豫州,地近夏都(阳城,今登封告城)。故《史记·货殖列传》曰:“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仲康时曾封其子于邓(今襄阳市北);历史上的“吕”(今南阳市西边)则是吕尚的先祖四岳的封地。史书云:唐虞时代,因四岳“佐禹治水有功,帝尧嘉之,封于有吕(在今南阳市区梅溪河以西)。”虞夏之际,又封于申(在今南阳市北20里)。

商因夏制。《汉书·地理志》曰:“殷因于夏,无所变改”,南阳仍属豫州。据近年来的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商文化的遗址已在本区域有多处发现,如南阳市的十里庙遗址、桐柏县的古台寺遗址、内乡县的黄龙庙遗址、南阳县的新集遗址等均有商代遗物出土。《史记》云,商代的先祖契封于商(今陕西商县),后自西向东转移于东亳。如是,南阳则是商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商文化向东部逐渐转移的桥梁。

而且,古申吕之国的南阳,以其西掩秦岭、北依伏牛、东接淮泗、南通江汉,扼关中而蔽瓯越,屏中州而握荆蛮的地理位置,成为兵家争战的必胜之地,殷商时代的武丁“奋伐荆楚”就把这里作为前哨阵地。《诗经·商颂殷武》篇云:“挾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这使商文化不断地向南阳方向传播扩展。

西周时实行分封制,各地封国林立,在南阳先后有申、吕、谢、应、邓、唐、蓼、楚等国。在南阳市东郊五福井村北发掘了一座周代墓葬,出土的遗物有铜马镳、铜车軎、铜鼎、铜盘、铜簋等。其中铜簋铸有铭文,计45字,中有“大宰仲禹父”字样。经有关专家考证认为“仲禹父”簋为申国之相、周宣王从兄弟行的宝器,它的发现确切地证实了西周时的申国就在今南阳市。周宣王时封其舅父申伯于谢,并让他借助谢人的力量来王化“南土”。藉以控制东南方面的局势,以对付南方日渐强盛的楚国。

春秋时,除了原来的吕、邓二国外,又分封了唐、郢、许、应、邲等国。随后,楚国崛起于南方,向北扩张,楚文王灭申、邓,置宛邑,南阳始称宛。楚国把南阳作为它北进的基地,欲与北方诸国相抗衡。正如《读史方域纪要》中说:“周定东迁,申、吕亦削,楚既灭申,而然问鼎于中原矣。”晋楚的城濮之

战,楚成王就是在南阳坐镇指挥的。1979年在淅川县仓房乡东沟村的南边,发现了大规模的楚国墓葬,其中大型墓葬9座,小型墓葬22座,车马坑5座,出土了大批文物。精品文物主要有:铜甬钟一组26件、铜鼎15件、铜禁1件、玉石排箫1件等。铜器上的铭文有“王子午令尹子庚”等。据《左传》载:公子午为楚庄王子,共五弟,康王时为令尹,公元前552年卒。这一处重要的楚国墓群,足以说明南阳此时已被楚国占据。

战国后期,宛为韩地,周赧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91年)秦使司马错攻楚。在秦败楚之后,秦的势力逐渐东移。《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十五年(公元前292年)白起攻楚取宛。”次年,秦昭襄王封其舅父魏冉于穰(在今邓州市境内)为穰侯,并以此为据点,以图东进。公元前280年,白起攻楚时,把俘虏与国内“罪人”流放到宛;公元前272年,秦置南阳郡,郡治于宛。秦之南阳郡,包括整个南襄盆地及其边缘地区,它辖有今之河南叶县以西沿着伏牛山岭向西,直到内乡、西峡一带,南则以大洪山为界,自湖北省的应山县而西,直到郧阳县间。

秦王朝的统一中国,结束了长期以来封国林立,混乱纷争,割据称雄的局面,南阳郡居全国三十六郡之一。范围扩大,经济实力加强。

据《史记·高祖本纪》载,楚汉战争之际,刘邦经南阳入关时,攻南阳不下,欲引兵绕道西行,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刘邦以为然,遂“匿旌旗,人衔枚,马束舌,鸡未鸣围宛城三匝。”迫使南阳郡守投降。可见南阳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

西汉建立后,仍置南阳郡治于宛。宛,地处南北交界处,又是长江、汉水、淮河三水路与关中来往的孔道,交通便利。《史记·货殖列传》云:“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从宛西行,过武关、商洛至长安、咸阳,称武关道。从宛南行可至郢(今湖北江陵);向东北可经陈、蔡达于齐,古称“南方大道”或“夏路”。由南阳出夏路向东南经汝颖下游平原,到达淮河南北,不但财货周流,畅通无阻,也为文化的传播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随着秦汉时代对东南和南方的开发,宛城成为南北交通的要冲。文化发达,商业繁荣,人口剧增。《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时南阳郡“户三十五万九千三百一十六,口一百九十四万一千五十人。县三十六。”成为西汉的五都(另有洛阳、临淄、邯郸、成都)之一。

在东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南阳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南阳蔡阳刘氏起兵反莽,在围攻宛城的过程中,于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刘玄在宛城外的淯水(今白河)沙滩中设坛场,即皇帝位,取年号“更始”。同年六月,攻下宛城,在南阳建立了更始政权,灭亡了王莽的新朝。

更始三年(公元25年),刘秀起帝业于南阳。在刘秀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南阳人是主力军,为东汉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到了东汉,南阳进入了鼎盛时期,刘秀定都洛阳后,把宛作为陪都。东汉时的宛城,规模宏大,有外城、内城两重。外城即郡城,亦即郭城,周长18公里。内城即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南隅。城内皇亲国戚不能尽数,王侯将相宅第相望。“士女沾

教化，黔首仰风流”。封到南阳的列侯和公主就有 52 人，诸侯帝王巡视南阳怀旧祭祖达 12 次。城内居住着世代名族，如邓氏、阴氏、来氏、樊氏、岑氏等。此时的南阳经济发达，人口增

加，据《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时“南阳郡三十七城，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帝乡南阳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汉代南阳的政治经济文化

两汉时期，南阳的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政治地位重要。西汉初建，沿袭秦朝旧制，仍设置南阳郡，管辖 36 个县。汉初统治阶级信奉“无为而治”的黄帝思想，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经过七、八十年的时间，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并且发展繁荣起来。

西汉时期，南阳郡的冶铁业、手工业、商业、农业都迅速发展起来，郡治宛城与洛阳、临淄、邯郸、成都并称天下名邑。

南阳是汉代著名的冶铁基地之一。早在战国时代，南阳的冶铁业就较为发达，《荀子·议兵篇》云：“宛钜铁镞，惨如蜂蛰。”西汉王朝共在 49 个郡县设置铁官，南阳郡为其中之一处。孔仅是西汉时期南阳著名的冶铁专家，再加上他具有综合管理的才干，所以被汉武帝刘彻委以重任，出任大农丞，管理全国的盐、铁、农三业。孔仅任职大农丞的十余年时间里，他采取措施，制定冶铁法规，推行铁农具和铁工具，使经济空前发展，官府库存充实。这对汉武帝雄伟谋略的施展，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孔仅在南阳大兴冶铁业的史绩。东汉时，南阳郡太守杜诗总结前人水碓机械的经验，创造“水排”鼓风机械，大大提高了冶铁的效率，促进了冶铁技术的进一步改造，使南阳的冶铁业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在欧洲，水力鼓风炉直到 20 世纪才开始应用。南阳汉代的冶铁工业，经孔氏家族和孔仅及杜诗等人卓有成效的经营，在冶铁技术上多有发明创造，如热鼓风熔炉、空心熔炉座、水力传动鼓风机械、双堆叠铸技术、较大型退火脱碳炉等。南阳汉代冶铁业的发达水平，可从 1959—1960 年发掘的南阳市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中得到一定反映^①。

到目前为止，南阳已经发现汉代冶铁遗址十余处，可见当时南阳冶铁业发展的空前盛况。南阳郡铁官的铁器，向西南、东南、南部和西部地区输出，约占 103 个郡国的十分之一。考古发现，在汉朝的豫章郡（今江西省）和右扶风（今陕西省永寿县）均出土有“阳二”铁锤，足见南阳郡铁器外销的繁盛情况和产量之多。在南阳发现的汉代铁制工具有：镰、斧、犁铧、锤、刀、铲、镢、铤、凿、锤等。

冶铁业的发展，促进了铁制工具的质量提高和数量增多，为水利、农业、交通业、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冶铁业的发展也为汉代南阳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西汉时，在南阳设置工官，为全国九个设工官的地区之一。汉代“南阳工官”继承了战国以来兵器生产的优势，主要生产矛、盾、刀剑、弩机等兵器，其产品输往京师长安。1986 年—1987 年，在西汉长安城内未央宫三号遗址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南阳工官”铭铜弩机^②。这批弩机形制大制造精，其中一件完整弩机，通长 10.6 厘米、前宽 2.14 厘米、后宽 3.3 厘米、高 4 厘米。其铭文格式为“南阳工官第二千一百卅”等，弩机编号最小“第五十九”，最大的“第二千二百一十四”。南

阳工官制造的铜弩机大量地被储存到京都长安，可见西汉南阳兵器制作相当发达，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

汉代南阳郡治宛城的铸铜、制陶等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制陶遗址位于瓦房庄冶铁遗址东北部 200 米，是烧制陶罐、筒瓦、板瓦、瓦当、瓦钉、陶钱、陶盆、陶釜、陶瓮、陶纺轮、陶鸡、陶狗等的作坊，而且在制陶遗址中出土有不少的陶器^③。南阳汉代画像石墓及其它汉墓中大都出土有数量不等的各种陶器，表明汉代南阳的制陶业相当发达。

铸铜遗址位于瓦房庄冶铁遗址东南部^④，东西宽 52 米，南北长 50 米，出土遗物有铜渣、各类车范、铜镞、五铢、大泉五十钱等，表明这是一处铸造车马饰物和日用铜器的场所。

汉代南阳铁官铸造的大量的铁制工具，为大规模兴修水利提供了锋利的工具。汉代南阳郡的水利建设卓有成效。西汉的召信臣，在南阳郡任太守期间兴修水利，劝民农桑，戒奢尚俭，大兴教化，被人们誉为“召父”。据《汉书·循吏传》记载：信臣“任南阳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为人勤力有才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水泉，交通沟渎，起水门提閤凡数十处，以广灌溉，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邓州志》也记载道：“（汉）元帝建昭间，南阳太守召信臣于穰县造钳卢等陂”。

汉代兴建的陂池堰渠主要有：钳卢陂、六门陂、樊氏陂、邓氏陂、召父渠、郑渠堰等。新野境内承洧水修建的新野陂，灌溉面积很大。这些水利设施，形成了一套蓄水灌溉系统，为汉代南阳农业丰收提供了保障。

农业生产技术的先进，表现在农业生产的发展，铁器时代的汉朝则表现为广泛使用铁农具和普遍采用牛耕。汉代南阳发达的冶铁业，南阳铁官生产的大量铁制农具，为南阳郡农业生产广泛使用铁农具提供了保证。南阳出土的汉代铁农具不仅有镰、锄、铲等，而且还有犁铧、耨铧等。从南阳发现的西汉铁犁、V 形铁口犁、铧和耨范来看，铁制犁铧上口加宽，两侧犁叶加长，铧锋角度小，加强了破土力。南阳还发现有西汉耨足范，说明当时已使用耨播，可使开沟、播种等生产工序一次完成，而且播种均匀，深浅一致，是先进的农具。南阳虽然截至目前还未发现有反映“牛耕”内容的汉代画像，但从我国其它地方已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和壁画中的牛耕图表明，至少在汉代牛耕已经相当普遍。新中国建立后，考古工作者发掘的南阳英庄汉墓的画像石上刻有“牛车”图像，再加上已出土南阳汉画像石墓中刻划的一些造型逼真、栩栩如生的“牛”的形象，据此我们判断，在汉代南阳的农业生产很有可能已采用牛耕。1994 年在南阳市七里园乡邢营汉墓出土了一块“耕耘”汉画像石，图中有一农夫在长满庄稼的田间，手持长柄锄，为禾苗锄草壅土。

便利的水利设施，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再加上优越的地理环境，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使南阳在汉代成为一个

重要的农业大郡,农业生产相当发达,农产品极为丰富。汉代南阳农产品主要有小麦、大麦、稻、豆、黍、粟等作物,还有芋、葵、甜瓜、葫芦、笋、生姜、藕、芥菜等,果品主要有栗、枣、梨、桃、杏、梅等。纺织原料“大麻”在南阳也普遍栽种。

汉代南阳的家畜业也相当兴旺,鸡、鸭、鹅、马、牛、羊、猪、狗的饲养量相当可观。南阳汉代画像石墓中也出土了不少造型生动各异的陶狗、陶鸡、陶猪及猪圈,汉画像石及砖上刻有大量的牛、马、狗、羊、鹅、鸭等家畜,这表明汉代南阳六畜兴旺,家畜业发达。

冶铁业、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物产的丰富,必然带来汉代南阳商业的繁荣。汉代南阳民俗喜欢商贾,古文献中多有记载,《史记·货殖列传》云:“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俗杂好事,业多贾”。《汉书·地理志》又曰:“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

好商习俗使南阳的商业活动频繁,至迟在西汉中期以后,南阳郡治宛城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都市。正如《盐铁论·通有第三》所言:“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

汉代的商业活动主要在“市”里进行。市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官府出面在城内设置固定的商业区,供商人和手工业者进行商品交换和买卖。随着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市的规制趋于统一,规模日益增大,已在城市中占据一定的地位。汉朝的郡县治所一般都设有市,有的城中的市还不止一处,正如王符在《潜夫论》中所言:“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汉代南阳郡治宛城为全国著名的商业都市,所以宛城中也有“市”。据《汉书·食货志》和《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代主管市场事务的官员称为“市长”、“市令”,南阳宛城当时主管商业活动的官员称“市长”。王莽改制,把长安东、西市令和洛阳、宛、邯郸、临淄、成都市长改为五均司市,称市,下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东汉时在宛又设置交易丞和钱府丞,专管商业贸易之事。此外,在市内还有市掾、市门卒、市啬夫等市场官吏。市场官吏负责按时启闭市门,维持市场秩序,管理商人市籍,检验商品,评定物价,征收市税,检定度量衡。

通过对南阳汉代先进的冶铁业,发达的手工业和兴旺的农业以及繁盛商业的分析可知,至迟在西汉“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中,南阳的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南阳经济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时间长达三百多年。

南阳汉代发达的经济,使南阳出现了不少富商大贾和拥有万金的大地主,他们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踏入仕途,建功立业。如西汉文景时期,张释之以钱买官,官至廷尉;杜周家资巨万,官至御史大夫,历世显贵;孔仅,冶铁有方,“致产累千金”,出任汉武帝的大农丞,官至九卿。光武帝刘秀起兵反莽前是南阳的大地主大商人,曾经贩谷于宛;李通是以货殖闻名的大商人;刘秀的外祖家樊氏也是南阳的大地主兼商人。西汉末年游学京师长安的南阳人刘秀、刘隆、邓禹、卓茂、张堪、阴识等人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西汉时期南阳发达领先的经济,使南阳的政治地位逐渐

提高,成为贵族官僚们依附寄食的地方。西汉时封到南阳的王侯约30个^⑤。如汉武帝时出使西域的张骞被封为博望侯;新朝的建立者王莽曾被封为新都侯,汉哀帝时,王莽曾到新野都乡住了三年。南阳在西汉时在政治上有显赫地位者达13人之多,如张释之、孔仅、直不疑、杜周、杜延年等,他们在西汉中央政权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汉之际,南阳人的政治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南阳蔡阳刘氏起兵反莽,建立了更始政权,覆灭了王莽的新朝,王莽的首级首先传到南阳。光武帝刘秀起兵于南阳,在他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南阳人是主力军,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多为南阳人,如邓禹、刘赐、刘嘉、刘信、贾复、李通、陈俊、岑彭、杜茂、马成、马武、任光、吴汉等人,追随刘秀南征北战,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政权建立后,南阳人在中央政权居统治地位。正如《剑桥秦汉史》所说:“强烈的地方主义是整个这场内战的典型特征;光武帝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家乡南阳郡的胜利。通过他,来自南阳的人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取得并保持显赫的地位。”光武帝时南阳人任三公的就有10人,九卿13人。三公之一的大司马是全国最高的军事统帅,公元25年由吴汉担任,任该职长达19年之久;从公元44年至51年由南阳人刘隆担任。这说明东汉初期,军权一直控制在南阳人手中,南阳人对东汉政权的巩固做出了深远的贡献。

据对《后汉书》诸传记统计,东汉时南阳籍官吏达195人,任职三公的27人,任职九卿的38人,南阳人被封为侯王者120人。光武、明、章帝时期,南阳籍官吏有53人,和帝、灵帝时有51人,在朝政中举足轻重。东汉的南阳人大多为政清廉,广推教化,造福人民,促进了东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他们中有的任职中央政权,忠心辅政,为帝王出谋献策,谏朝政得失;有的任职郡守,兴修水利,发展经济,兴办学校,发展教育,造福一方百姓。南阳人为东汉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南阳的外戚集团影响控制东汉政权的时间较长,南阳所出的五位皇后光烈阴皇后、和帝阴皇后、和熹邓皇后、桓帝邓皇后、灵帝何皇后参政议政达81年之久,几乎占东汉统治时期的二分之一,对东汉政权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南阳人是东汉政权的政治支柱,为东汉王朝的政治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东汉历时195年,先后有七个公主、28个王侯被封在南阳,出自南阳的文臣武将众多。按汉代规定,朝官辞职后不得居住京城,只可返回家乡。南阳在东汉时被誉为“帝乡”、“南都”,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言:“洛阳与南阳是东汉两个最大的中心城市。”东汉的南阳皇亲国戚云集,达官显贵众多。东汉南阳郡守有名可考者42人,大都为政清廉,惩治贪污,打击不法豪强,除暴安良,缉捕盗贼,发展经济。如杜诗不仅冶铁有方,而且勤政节俭,爱民省役,诛暴立威,兴建水利事业,南阳人民称之为“杜母”。据《后汉书·王畅传》记载,王畅任南阳太守时,惩治豪强和贪官污吏,令受赃自首,若隐没不举,遣官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他们扶正祛邪,为官一任,造福南阳。另一方面,这些南阳郡守大都尊师重教,移风易俗,形成了良好的道德环境。章帝时,鲍德任南阳太守,主持修缮学校,“尊飨国老,宴会诸儒,”行礼奏乐,鼓励百姓崇节尚义^⑥。刘宽任南阳太守“好为诸生讲论经义”,每巡视属

县就要召集学官和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⑦汉代南阳私学兴盛,著名的教育家有尹敏、郭丹、卓茂、高凤等,教授门徒少则百人,多则数千人,使南阳汉代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培养了大批有用的人才。

东汉时期南阳良好的政治环境,使南阳的社会经济得到长久的发展。冶铁业、手工业、农业、商业继续发展,特别是冶铁业和商业达到了鼎盛期。东汉经济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庄园经济的发展。田庄是封建地主经营土地的主要生产组织形式。庄园内的农民与庄园主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田庄拥有自己的武装,保卫庄园。庄园地主可督促农民生产,兴办水利事业,推广新技术和经验。东汉时南阳郡内地主庄园很多,有的规模相当大。如刘秀母舅樊宠在唐河湖阳所经营的田庄,不仅有300余顷土地,而且还经营农林牧渔业,同时还从事某些手工业生产,庄园内自给自足^⑧。正如东汉人仲长统在《昌言·理乱》中所言:“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商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汉代南阳发达的经济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良好的政治环境又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南阳由于处在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地,两种不同风格与内涵的文化碰撞融合,使汉代的南阳文化不仅具有自己鲜明的风格特征,而且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汉代南阳发达的教育,培养了大批思想文化人才,积极进取、讲究名节的社会风气,促成了南阳在科技、哲学、文学、法学等方面得到长远的发展。

西汉时,南阳产生的一批政治地位很高的法学家如:直不疑、杜周、杜延年、张释之等人,多任廷尉、御史大夫等司法高官,在建立汉王朝的法制体系,保障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的法学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之际,南阳产生了一批精通儒学之士,刘秀、刘隆、邓禹、朱祐、卓茂、阴识等人都曾游学京师长安,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刘秀爱好经术,重视儒学,搜访儒雅,白天日理万机,“夜讲经听诵”,治国以“柔道”,即用儒家思想治国。邓禹13岁即能背诵诗经,精通儒典,令13子各守一艺。东汉时,南阳人研究儒家经典蔚然成风,并且著书立说。南阳汉代谶纬之学广为流传。谶纬之学是以预言与应验为特征并依附于经学的神学混合体。光武帝刘秀笃信图谶,以图谶起兵,以图谶称帝,以图谶用人。东汉诸帝也都重视图谶神学。据《后汉书》记载谶纬家58例,南阳占6人。最著名的当数樊英,他精通《京氏易》,善河洛七纬,“以图谶教授”,“受业者四方而至”。汉顺帝曾待以师傅之礼^⑨。南阳学者也多有谶纬著作,并且儒学谶纬化,用谶纬解释儒家经典,制定礼仪制度。

南阳的方士文化在汉代也比较发达。有的还是门徒众多的著名经师,有的是世代相传的儒学世家。方士文化依附于儒学,特别是依附于《易经》,构成了以《易经》为核心的、结构复杂功用广泛的阴阳五行哲学体系,这也是汉代易学发达的主要原因。在汉代,一般士人都要精通“术数”之学,即以各种方术观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现象,来推测人的气数与国家命运。南阳著名的政治家张衡、左雄、樊准、朱穆等人都精通术

数之学,并依据阴阳符瑞灾变理论指陈朝政得失。汉代的黄老道家神仙学说在南阳也大量传播。

汉代的南阳产生了一批文学家,留下了不少文学作品,主要代表人物有张衡、朱穆、延笃、刘毅、刘苍等人。张衡的《二京赋》、《南都赋》、《思玄赋》、《归田赋》尤为著名,他与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并称为“汉赋四大家”。他的《二京赋》是汉赋之长篇极轨,抒情小赋为辞赋发展开辟了新境界。《归田赋》是东汉赋风转变的扛鼎之作,语言上开汉赋骈丽之风气。张衡的《同声歌》、《四愁诗》是五、七言诗创始时期的主要作品。朱穆著有《崇厚论》、《绝交论》、《郁金赋》、《与刘伯宗绝交诗》等诗文近20余篇。延笃的文学作品有《贻刘祐书》、《与李文德书》、《仁孝论》,刘毅则著有《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上书请著太后注记》,刘苍写有《光武帝受命中兴颂》、《建武以来奏章》,左雄著有《上疏陈事》等。这些丰富的文学作品,不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是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体现了南阳士人忧国忧民的崇高精神境界。

南阳又是汉代科技之乡。张衡不仅是东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而且还是优秀的天文学家和机械制造家,他撰有《灵宪》和《算罔论》等天文与数学论著,已经认识到了宇宙的无限性和日食的原因。张衡发明并制造了世界最早的水力转动浑天仪、候风地动仪。他对星数进行观测,较亮的2500颗,常明星124颗,有名的320颗,这与现代天文学家在同一地方同一时间用肉眼看到的数目基本相同。由于张衡在天文、历法、数学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被后世尊为“科学之父”,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郭沫若先生评价张衡:“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宋均在天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他著的《尚书纬考灵曜》、《易纬通卦验》两部纬书,含有丰富的天文学内容。张仲景撰著的《伤寒论》和《金匱要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后代医学界奉之为经典著作,张仲景也被后人尊为“万代医宗”的“医圣”。

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成就了南阳的历史地位,也为南阳的艺术提供了一个广大的创作空间,汉代艺术在南阳有着辉煌灿烂的表现。在雕塑艺术方面,南阳汉墓中出土的大批陶狗,形体适中,比例匀称,造型逼真,形象生动,准确地塑造出狗的各种姿态,维妙维肖,收到了以形传神,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南阳现存的汉代大型石雕天禄、辟邪及虎头、龙虎座等雕塑,造型奇特美观,以奔放苍劲的艺术手法反映了汉代石雕艺术水平。汉代南阳舞乐百戏也极为发达。截止目前南阳已出土的40余座汉代画像石墓中大都刻有表现乐舞百戏的画像,汉画像中的乐舞场面的铺张恢宏与张衡在《南都赋》中对汉代南阳歌舞聚会活动汪洋恣肆的颂吟,相互辉映,再现了当年黄钟大吕、歌舞升平的盛大场面。南阳汉代的书法艺术水平很高,至今仍保存有不少汉代名碑精品,隶书有《越圉令碑》、《李孟初碑》、《赵葑碑》、《淮源庙碑》、《张景碑》等碑刻。出土于墓葬中的许阿瞿墓志及汉画像石、砖上的其它文字也都是书法精品。尤其是《张景碑》作为隶书成熟时期的典范作品,《许阿瞿墓志》作为汉代民间隶书最成功的代表作品,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很高的艺术价值。

汉代是封建政治走向成熟,文化呈迅速上升多元发展的

时代。在得天独厚的帝乡南阳,政治环境的优越,社会经济的发达,历史文化的深厚久远以及南北文化的交汇融合,这些条件从各个角度赋予了南阳强大的文化造就能力,孕育出了

独具鲜明地域特征的南阳汉画像石墓墓葬形式,为“深沉雄大”的汉画像石艺术的创造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广大的文化表现空间。

四、汉代的厚葬习俗

厚葬,开始出现在奴隶社会,从商、周至秦厚葬之风愈演愈烈,久盛而不衰。汉朝“文景之治”后,经济发达,物质财富充裕,厚葬习俗开始兴起,并风行各地。汉武帝刘彻即位后的第二年便开始了为自己修造茂陵,历时53年,及葬时,“其树皆已可拱”^①。汉武帝动用贡赋,搜刮民脂民膏,为自己建造规模宏大的陵墓,而且随葬许多豪华物品。据《汉书·贡禹传》记载:茂陵“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汉武帝之后,厚葬习俗益浓。汉成帝修造昌陵时,“卒徒工庸以巨万数,取土东山,与谷同贾。”^②名将卫青之冢象庐山,霍去病之冢象祁连山。据《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记载:西汉权臣霍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赐金钱、繒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篋,璧珠玕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皇帝和皇太后亲自为霍光送丧,可见权臣霍光丧事之隆重规模之宏大。在帝王将相厚葬的影响下,西汉的贵族官僚、地主富商竞相仿效,厚葬之风弥漫整个社会。正如《盐铁论·散不足篇》所云:“今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槨槨,贫者画荒衣袍,繒囊缁褙。”

东汉初建,光武帝刘秀实行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农业生产恢复,经济发展起来。东汉时期,厚葬习俗仍然盛行。汉和帝慎陵三百八十步见方,安帝恭陵十五丈之高。京师贵戚,名门世族,郡县豪家,比附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后汉书·张衡传》所言:“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东汉时丧葬僭越现象屡禁不止,厚葬之风比西汉时更加炽盛。东汉人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赉奉,车马帷帐,货假待客之具,竟为华观,……今天下浮侈富本,亦已甚矣。”“边远下土,亦竟成仿效。……工匠雕刻,连累日月。”

汉代的丧葬习俗有:沐浴饭舍、衣衾、棺槨、发丧受吊、送葬、从葬之物、坟墓、祠墓、归葬、合葬、改葬、赠赠、护丧、丧期、居丧之礼、上冢等诸多程序与种类。

与厚葬之风相适应的是汉代人重视守冢成俗。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下令二十家为始皇帝守冢,为楚王陈胜、魏安厘王、齐闵王各派十家守冢。至于西汉诸帝陵,不仅迁徙山东豪强于陵旁,置县,而且设置陵令、属官、寝庙令、园长、门吏等官职,负责管理陵园,岁时祭祀。如汉武帝的茂陵就有五千人,担任守陵、浇树、扫除等差事。汉代守冢之人居住之所为庐舍。汉代忌讳刑徒上冢祭祀,《风俗通》载云:“徒不上墓”。汉代的归葬之风也较为流行,军士死于外地,可车归葬;父死外地,子千里负骸归葬被视为大孝;友客死他乡,知己友人为其扶丧归葬,世俗美之;朝臣年迈,可乞骸骨归葬故里,

如唐河湖阳郁平大尹冯孺久在郁平(今广西桂林)做官,葬归家乡。

汉代盛行厚葬之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汉代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物质财富丰饶,这为厚葬的盛行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其次,汉朝帝王将相厚葬典型的影响。汉代皇帝厚葬,诸侯王及上层官僚也竞相效仿。如已发掘的精美华贵的黄肠题凑墓,均为汉代诸侯之墓;又如随葬品达数千件之多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是长沙国丞相的坟墓。在中央集权制的大汉王朝疆域之内,全国范围内经济与文化的空前发展与交流,信息的流通与传播,使得统治者的意志或倾向能够迅速无阻地行遍四方。上行下效,“京师贵戚”至地方富豪遂纷纷厚葬。厚葬亦借此渠道自然而然地风靡天下。汉代南阳经济文化发达,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富商地主云集,他们的丧葬制度也深受影响。第三,是灵魂不灭观念的影响。东汉人王充在《论衡·薄葬篇》中分析道:“以为人死辄为鬼神而有知”,“……谓死如生,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积浸流至,或破家尽业以充死棺。”汉代人们以为活人需要的,死人同样需要,便不遗余力地在坟墓中构划出一个如同生时的冥间世界。第四,儒家思想中的孝道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使汉代人普遍认为厚葬是致孝的具体表现。自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成为汉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崇尚孝道,并藉此选贤任能。“贤以孝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贤臣必于孝子之门。’”^③汉代人认为“忠”、“孝”是不能分开的,有忠才有孝,厚葬是致孝的表现。基于此,汉朝的豪门世族、官僚地主富商以及平民百姓皆以事亲孝为重,不少人殫尽财富,对父母极尽厚葬,以求得孝名为进身之阶梯。厚葬之风的盛行,竟使一些投机钻营之徒,借厚葬欺世盗名,来捞取声誉地位,以求得封官晋职。如西汉末年的原涉,退还别人赠送的丧葬费,薄葬其父,此后“行冢庐三年”以表其“孝意”,“由是显名京师”。被举荐为官吏后,又觉得“令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乃大治起冢舍,周阁重门”,于是博取了更大名声^④。正如《盐铁论·散不足篇》所云:“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崔宴在《政论》中也对此揭露道:“念亲将终无以奉遣,乃约其供养,豫修亡殁之备,老亲之饥寒,以事淫汰之华称,竭家尽业,甘心而不恨。”

正是由于汉代厚葬之风久盛不衰,墓葬内埋藏着不少随葬品。一遇到灾荒之年,贫困者无衣无食,生活无门,只好去掘墓。所以王充说“岁凶之时,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掘墓之事在汉代数百年间,时有发生。西汉末,赤眉农民起义军入关,曾于咸阳北原发掘诸帝陵。及至东汉末,军阀混战,陇西军阀董卓于公元191年(初平二年)挖掘洛阳诸帝陵,盗

去珍宝，西逃长安。董卓是汉代历史上第一个盗墓的大军阀。此风一开，军阀竞相仿效，盗墓之事接踵而来。南阳的盗墓之风也由来已久，已发掘的40余座画像石墓也大多十室九空。

通过古代文献记载，我们了解到汉代的下层劳动人民贫

困潦倒的生活，他们大多死后不能葬埋，或为猪狗所食，或露尸于野。据《后汉书·独行传》记载：周畅为河南尹时，收藏洛阳城旁客死者骸骨百余人。京都洛阳平时不得葬者尚且如此之多，可以设想在荒年或战时，贫困百姓死而不能葬者是难以计数的。这与汉代统治阶级的厚葬习俗形成鲜明的对比。

注释：

①李京华、陈长山著《南阳汉代冶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未央宫第三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1期。

③④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市瓦房庄汉代制陶、铸铜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4年1期。

⑤《汉书》补注《王马侯·恩泽侯·功臣表》。

⑥《后汉书》卷29《鲍永传》。

⑦《后汉书》卷25《刘宽传》。

⑧《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

⑨《后汉书》卷15《邓晨传》。

⑩《晋书·索琳传》。

⑪《汉书·杨雄传》。

⑫《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934页，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

⑬《汉书·原涉传》。

第二章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的分期

一、南阳汉代画像石墓的发现过程及分布

自东汉末年之后,盗墓之风日盛,汉画像石墓也开始被人拆毁。在千百年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画像石出土后或散置于荒郊野外,或被移作它用。现代发现的一些魏晋墓中就有再次利用的汉画像石。现存民国时期的清宛南书院旧址,系由明代古刹东大寺改建,其殿宇石基础有不少汉画像石。明、清南阳城墙基础中,也使用了大量的画像石。民居基石、桥墩、路面、石阶使用画像石更是随处可见。南阳民间的一些传说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黄渠河上有座“玉石月牙桥”,实指建于桥上刻有月亮的画像石;博望桥下有“石人大睡觉”,实指横砌于桥基上的人物画像石。对此,因无人知其为汉画像石,便误认为是神仙造化的古景。历代金石学家对南阳的汉画像石均未著录,所以直至本世纪初,无论民间或者是学术界,皆不知南阳有汉画像石,更谈不上对其价值的多角度的文化认定了。

南阳汉画像石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被发现的。约在1923年——1924年间,时为北京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生的南阳籍学者董作宾与南阳人士杨章甫等人首先在南阳城附近发现了一些石刻画像,并认定其为汉代遗物,但不知其用途。孙文青先生在《南阳汉画访拓记》中讲到:“南阳汉画像石不见于著录,民国十二、三年间,邑人董彦堂、杨章甫等始有发现,尝以未能一睹其概为憾。”^①虽然当时的汉画像石散见于南阳各地,董先生的发现也可能是零星的,无法观察到画像石的全貌,但是,由于他的开创之功,继其后而发现、搜集和研究画像石的学者接踵而至。在董先生未发现南阳汉画像石之前,世人只知道山东有汉画像石,这是因为历代金石学家都对这个地区的汉画有所著录,特别是1786年黄易发现了嘉祥武氏祠的画像石,更使山东画像石名声大振。董作宾对南阳汉画像石首次发现之后,又经其他学者的努力,使久不见经传的南阳汉画像石呈现于世人面前。1928年冬,南阳籍著名教育学家、方志学家、河南通志馆编修张中孚奉命回宛赈灾。工作之余,他偶然发现一些墙基中间使用有不少与山东汉画像石相类似的石刻画像,于是使用部分赈灾款,开始寻访画像石。最后他把访拓到的汉画像石数十幅拓片带回开封,交给时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的关百益先生,由其选取40幅编成《南阳汉画像集》一册,于1930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是南阳汉画的第一本图集。由此开始,南阳汉画像石为学术界所注意。

真正明确南阳汉画像石的用途是用于构筑汉代墓葬的建筑材料,是在1932年,南阳草店汉画像石墓出土之后,这个谜方被揭晓,其功劳当归于孙文青先生。1931年夏,白河水暴涨泛滥,两岸多处被冲坍塌。在南阳城西南18里草店村附近,被水冲刷露出一座古墓。作为南阳籍的学者,孙文青先生不仅勤于中州文献的搜辑,而且一向偏爱于金石学的研

究。关于对家乡画像石的寻访,据他在《南阳草店墓汉画像序》中所言:“余留心画像,在二十一年(即1932年)……见画像石刻,多散露于廊阶之间,曾略加研讨,恒以不知其石之功用为憾。”^②因此,当他从同仁那里得知草店村被水冲刷露出一座汉墓的消息后,便于1932年秋亲自去查看,发现该墓一半被淤泥所掩埋,只有梁和门楣还露在外面,于是他便邀请美术教师郑容众测绘,物理教师吴子千照像,另寻拓工,对草店汉墓进行了清理发掘,从中得到画像石27块,画像44幅,并对墓葬的发掘情况写就《南阳草店汉墓画像记》一文,发表在1933年10月6日《国闻周报》第10卷第41期上。该篇文章使南阳汉画像石做为墓葬建筑材料的功用第一次得到了文化认定,为金石考古界揭开了一个历史文化之谜。南阳草店汉画像石墓,是南阳汉画像石墓第一次具有考古学意义的发现和发掘。尔后,孙文青先生又在南阳县石桥镇东门外汉墓得到汉画像25幅及随葬品数十件,在南阳县北广阳镇(今方城县广阳镇)桐庄西太子岭汉墓得到汉画像6幅,在南阳城内及通往各县的交通道上,发现了274块画像石,并制作了近150幅拓片,还记录了这些画像石出土、分布及画像内容情况,写出了《南阳汉画像访拓记》^③。1937年,孙文青编著的《南阳汉画像汇存》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该书收录汉画拓片145幅。这是董作宾发现南阳汉画之后的第一本大型图录,也是解放前收集和发现南阳汉画像拓片最多的图录。

为南阳汉画像石做出突出贡献的还有鲁迅先生。鲁迅搜集与研究拓本的历史很早,对南阳汉画像石的关注,则是始于三十年代。1929年3月23日,他在致友人许寿棠的信里首次谈到汉画问题。1935年8月11日,鲁迅在回复台静农的信中写到:“南阳画像,也许见过若干,但很难说,因为购于店头,多不明出处也,倘能得一全份,极望。”^④这是鲁迅谈及南阳汉画像石的第一封信。随后,即在1935——1936年间,他委托王冶秋、王正朔、杨廷宾等人代为收集南阳汉画拓片231幅,《鲁迅藏汉画像(一)》发表了他的南阳汉画拓片主要藏品^⑤。鲁迅先生对南阳汉画的关注,推动了南阳汉画事业的开展和发展。

南阳汉画像石及汉画像石墓的大量发现、发掘和收藏是在建国以后。1958年,河南省政府拨专款改造了南阳市魏公桥和七孔桥,拆下用于建桥的画像石100余块。各县市经过数次文物普查,发现了大量的画像石,其中一部分已入南阳汉画馆收藏。尤为重要的是,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了大批的画像石墓,为全面正确地认识南阳汉画像石的价值提供了科学依据。1956年4月,在南阳城北门外七里园发现一座汉代画像石墓,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南阳文物干部的协助下对该墓进行清理发掘。该墓为建国后在南阳发现的第一座汉

代画像石墓。从1962年到1975年,又相继发现和发掘了南阳杨官寺、南阳市西关、南阳县英庄、南阳军帐营、石桥、唐河针织厂、南阳市李相公庄、南阳县王寨、英庄、邓州长冢店、唐河电厂等10余座汉画像石墓。1976年,“文革”结束,文物工作开始恢复正常。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建设,更多的汉画像石墓诸如方城县东关、唐河石灰窑、方城县城关、新野县前高庙、唐河湖阳镇、方城党庄等多座有价值的墓葬被先后发现和发掘。据统计,现已发掘画像石墓40余座,既有完整的汉墓,也有后人利用汉画像石墓中的画像石重新建筑

的墓葬。从地域的分布看,这些汉画像石墓主要分布在南阳市及其附近地区,其次分布在唐河、方城、邓州、新野等地。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其中南阳市及其附近地区就多达25座,唐河有8座,方城3座,邓州2座。这些墓葬,大部分已发表了报告。

大批汉画像石墓的发现和发掘,对于认识和研究南阳汉代文化的发展和兴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随着汉墓的不断发掘和汉画像石的不断发现,对汉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研究将会更加深入。

二、南阳汉代画像石墓分期研究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最早发现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解放后至今,考古工作者先后共发掘和清理了数十座汉画像石墓,其范围遍及汉代南阳郡所属各县。这种墓葬多是先在平地上挖一竖穴土坑作为墓圻,然后在土圻内以石(或砖石并用)砌筑墓室。墓圻的前端一般都开挖有斜坡形的墓道,这种墓道便于运料和入葬。由于汉代盛行死则同穴的葬俗,所以,汉画像石墓大多为夫妻合葬墓。其平面布局和空间立体造型大都是模拟了地上的房舍建筑格局,第宅化特征很明显。几乎每墓皆构置有石质墓门,门扉可以自由启闭。此种仿阳宅建筑形式的墓葬也为二次入葬提供了便利。汉画像石墓圻上的地表原来都有大小不等的封土堆,封土堆形状多呈圆锥形,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封土堆早已被夷为平地,仅有少数仍部分残留着。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与其它地区的汉画像石墓相比,有着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同时,其墓葬形制及结构、画像位置及内容、雕刻技法及风格和随葬器物的特征与组合形式又因时间的早晚不同而有所变化。我们把已发掘的30余座较完整的墓葬进行排比分析之后,将其划分为四期:

- 第一期:西汉中期;
- 第二期:西汉晚期;
- 第三期:东汉早、中期;
- 第四期:东汉晚期。

从这四期墓葬可以看出,大约在西汉中期,也就是武帝以后,南阳一带已兴起构筑坚固而华丽的画像石墓;经过西汉晚期的发展,至东汉早中期达到它的鼎盛期;东汉晚期以后逐渐衰落下来。在东汉之后的三国至魏晋时期,又出现了利用原汉墓中画像石材作建筑材料重新建造画像石墓的现象,这种现象正说明了东汉以后新的画像石墓不再兴建了。三国魏晋时期二次利用汉画像石建造的这类墓葬不同于原汉画像石墓,我们将其称为“再葬画像石墓”。南阳市区及其附近一带现已发现并发掘了10余座这种墓葬,约占已发掘画像石墓总数的四分之一,它是南阳汉画像石墓的特殊形式。因其墓葬时代晚于汉代,故将其单列于后另加论述。

第一期

本期是南阳汉画像石墓的产生期,其时间为西汉中期。

此期墓葬目前已发现的仅有两座,即:

唐河湖阳镇汉画像石墓

南阳市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 J

这两座墓的建造时间大约在西汉中期的昭帝和宣帝时期。

(一)墓葬形制及结构

此期的两座墓平面布局均为长方形(或近正方形),其中湖阳墓规模较小,形制也较简单,只有三个并列的主室,无前室,也无侧室,随葬品置于墓道内的一土坑之中。赵寨墓形制较复杂些,它除了主室之外,又增加了前室及两侧室。这两座墓均为砖石混作结构,但在建筑形制上又各有特点。湖阳墓为典型的砖石混作墓,墓壁均以条砖砌筑,墓顶以楔形砖券筑成弧形拱券顶,仅有墓门部分用石材构筑。而赵寨墓除了两主室用单层子母樨楔形大砖券顶以及主室和侧室的墙体用砖砌筑外,其它部分均以石材构筑。两侧室及前室顶均以条石横铺成平顶,这种墓顶结构是沿用了战国木椁墓顶的覆盖法,即用石条代替方木覆盖墓顶。二墓均构置有石质墓门,湖阳墓在并列的三个主室前设有三个墓门,赵寨墓在横前室之前开有四个并列的墓门,四墓门与两主室和两侧室门相对应。由此可见,早期的画像石墓一般是有几个并列的墓室就开设几个墓门,呈现出数门并列的特征。

(二)画像石

早期画像石墓中所刻画像较少,石材的刻画利用率较低,有画像的石面在整个可刻画像的石面中一般要低于百分之五十,且画像仅限于墓门扉、门柱及门楣石的正面。墓室内不见刻有画像,如赵寨墓用石材数量很大,但大多为素石,仅墓门正面刻画像。早期画像内容也较为简单,以写实为主,主要为几何图案和建筑画像两大类。几何图案所占比例最大,如湖阳墓门上均刻画成装饰图案,门楣为连弧纹,门柱和门扉都是菱形纹;赵寨墓的门扉及门柱下半部分皆刻画图案,柱下部是菱形图案,门扉下部是五星联珠图案。另外,赵寨墓中建筑画像占总画像的一半,五个门柱及八扇门扉上半部均为重复的阙、楼阁建筑画像,这种建筑画像都十分对称,具有明显的图案化特征。早期画像的雕刻技法主要为凹面阴线刻和阴线刻两种,另外已出现了少量的浅浮雕。赵寨墓中的画像均使用横竖纹衬地凹面阴线刻和局部阴线刻相结合的雕刻技法。湖阳墓则不同,它的门楣画像是斜纹衬底浅浮雕,门扉画像采用阴线剔纹的方法,用不同的纹向使图案显示出来。这两座墓中的画像题材比较单调,内容多有重复,雕刻刀